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九六期 ——
(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409d)

【史海钩沉】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的谈话	王 力
【史料辨析】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王年一·何蜀·陈昭
【学术争鸣】“九一三”毛周是否逼林出逃?	陈晓宁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的谈话

• 王 力 •

我看到不少国内的和国际的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著作，都不知道或者忽略了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的一次重要谈话。这样，对于“一月夺权”及其以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毛泽东，就难以做出科学的评价。所以我先把它客观地加以介绍，然后再提出我自己的看法。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过生日，晚上临时通知，毛主席和江青请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没有林彪、总理、陶铸、康生、李富春。我们到时毛主席早就在等着了。

那天屋里很热。吃饭是按他们的惯例，他招待外国人也是这样，四菜一汤。今天每人加了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吃饭前毛主席说了很多话。他从来不过生日，这次过个生日。这实际上是个重要的会。这次毛主席的讲话我印象很深的是，毛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巩固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

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

毛主席说：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联，大串联使全国革命连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者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以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缴械了。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毛主席说：最近时期出现新的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冲破了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另外，革命学生起了变化，发展壮大，提高了。革命学生到工人农民中去，同工农相结合。还有一个特点，党和国家机关的革命干部起来造反了。主力是工人，没有学生和工人的结合也不行，没有机关干部也不行。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毛主席讲话总的概念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吃饭时毛主席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话在吃饭前也说过。

除上述的话外，他吃饭前还说了很多话。这些话在后来的文章中找到。虽然没有用黑体字，但思想是毛主席的。“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话是正确地概括他对当前形势和今后作法的想法。有人说毛主席说“要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这次我没有记得听他说过。他说的“全国全面”，是指的工矿企业和农村。他说一定要搞工矿企业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而废。“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口号，毛主席说是抓革命才能促进生产，人的思想革命化了，才能解决生产的方向道路问题，才能把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框框搞掉，搞出一套新的规章制度，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毛主席说，有人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乌纱帽，他们关心的是保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那些旧框框。他们害怕群众革命革到他自己头上。他们过去靠旧框框吃饭，离开旧的一套就不会走路，就不会说话。挑动群众停止生产，挑动群众斗群众，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自己就要成为走资派。任何阻挡这场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工人农民中去，一切抵制工人农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应该驳斥，都是错误的。工人农民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抗挡的历史潮流，一切企图阻挡的人都要被历史潮流冲掉。毛主席说，他同陶铸分歧的实质就是这个。

那时相当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对此都不理解。原来说是地委以下都不搞文化大革命。后来工矿企业和农村也要搞文化大革命了。这两个指示都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起草的，可是我这起草人之一，开始也没有认识到毛主席为什么要做出这样重大的改变。

毛主席过生日的谈话后我才知道。毛主席还说：斗、批、改，改什么？光在文化部门、机

关学校改，改些什么？整个国家文化大革命改些什么？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工矿农村还是老一套，那还改什么呢？那就没有目标了。至今人们大概也还不知道这个问题的背景。文化大革命是个悲剧，毛主席没有达到他原来设想的目的。有的人真的以为毛主席就是为了天下大乱，可是，自己打下的江山，为什么要叫它乱？

这次毛主席过生日才说得比较透彻。毛主席认为旧机器要改成新机器，旧方法要改成新方法，旧秩序要改成新秩序，旧制度（不是指社会主义制度，是说旧的规章制度）要改成新制度，旧纪律（对直接上级绝对服从）要搞掉。毛主席关于大民主的思想，就是这样来的。他认为我们旧的一套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同苏联差不多。他认为大民主好，便于攻击敌人，也能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人直接监督，造成新的社会风气。毛主席还讲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保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不但没有大民主，连小民主也没有。专政机关，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专政机关要保障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的正常进行，专政机关不能干涉甚至压制，不能乱抓人。只能对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放毒不是指说怪话反对领导，而是真正地去放毒药。）制造交通事故、暗害、间谍活动这些现行反革命要专政，依法制裁。革命群众要发动起来，帮助监督专政机关，保障实现无产阶级大民主。

毛主席反复讲，放毒不是指思想上的问题，思想反动的，坚持资产阶级思想的，只要没有违法，就不能抓。要摆事实讲道理，同他辩论。他说，专政限于很小范围。党内问题，不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好，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也好，在党内、政府内、民主党派内部，即使确有证据的特务，也要一人不杀。这一条，文化大革命中我听毛主席讲过多次。这一点他是坚持的。但他没有坚持大部不抓。过去说大部不抓，是指确有证据的间谍特务都大部不抓。可是后来扩大到对打倒的大部都要抓了。他没有坚持过去的大部不抓。

毛主席说，看起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不能说已经解决了。他说，这个斗争不是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从一搞社会主义就开始了。究竟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两条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说，这一斗争现在也没有了结。刘少奇之后这斗争还是在斗。各级、各个领域都存在这个问题。他们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在很多方面都有影响。清除这些影响，使各方面、各领域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还要作深入细致的工作，还要有很长时间的斗争。毛主席说，一定要有革命领导干部参加文化大革命，要打破清规戒律，打破束缚群众的框框，到群众中去，同工人农民学生在一起，参加斗批改，实现机关革命化。要坚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领导干部的批判要治病救人，团结大多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毛主席看来，越来越多的领导人会站到革命群众方面来，支持他发动的群众的革命运动。他说极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耍两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众打倒，这极少数人是“咎由自取”（这四个字毛主席用的是陶铸的话）。

毛主席在吃饭之前说了上面一些话。这是他提出的“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基本内容，也是他一月份号召全面夺权的根据。这也是他反复强调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根据。这一番话，也比较完整地表述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饭桌上没有说什么话，只是祝酒说了一句。吃完饭闲谈几句各人就回去了。毛主席过生日的这次谈话，是文化大革命中比较重要的一次谈话。这次谈话以后，我有一些想法，认为自己的思想落后于毛主席，落后于运动。觉得毛主席总是站在前边，我们总是赶不上。认为毛主席讲得很深刻，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年，他作了概括的总结，使我们比较清楚地懂得了一些东西。

当时我是拥护毛主席的路线的，这是主要的方面。不象别人的回忆录说的，自己当时就对毛主席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事后圣人，反正当时我没有看见过一个坚决斗争的。那时自己是否没有疑问？也不是。这样的搞法，到底怎么样？我有点担心。当时听了毛主席讲话之后一两天，我对给我开车的中联部司机王贵说：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年，还要大搞，看起来所

有的干部都要被打倒。后来一九八二年我从秦城出来后，王贵对我说：你看得真准，后来果然是所有领导干部都被打倒了。但是，当时我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 选自《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 3 2 2 — 3 2 9 页

~~~~~

# 【史料辨析】

## 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 王年一 • 何蜀 • 陈昭 •

毛泽东为了获得军队的支持以推行“文化大革命”，曾把原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树为党的第二号人物，并在 1 9 6 9 年春天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正式确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那时在全国各地每天例行的“政治祈祷”（“早请示晚汇报”仪式）中，大家都要“颂祷”这样两句话：“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然而，两年之后，中共中央突然宣布，1 9 7 1 年 9 月 1 3 日，林彪“仓惶出逃，坠机在蒙古”，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官方对此的解释是林彪“叛党叛国”。然而，这位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接班人”林彪为什么要叛党叛国、阖家出逃呢？

1 9 9 6 年 1 0 月 3 1 日，王年一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对林彪集团的再认识”曾提出：“‘九·一三’事件是给逼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毛制造出来的。”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在蜚声中外的大作《晚年周恩来》中也用了这个“逼”字，该书第 6 章的一个小标题就是“把林彪逼上绝路”〔1〕。本文要探讨的是，毛泽东为什么、又是如何把自己钦定的“接班人”林彪逼上绝路？

中共“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史无前例”地确认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文革”前刘少奇也曾被指定为“接班人”，却未能享此殊遇），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重点发言，肯定了林彪在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替代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之地位。表面上看，这次大会似乎标志着林彪的“革命生涯”正通向光辉的顶点，其实，顶点的前方就是深渊，在“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的视野中，此刻林彪已成为毛泽东的“斗争目标”。面对步入晚年的毛泽东，林彪滑入政治深渊的速度比当年的刘少奇更快。1 9 7 0 年，中共召开了“九届二中全会”，会后林彪的遭际几可用林黛玉在《葬花词》中的一句话来形容：“风刀霜剑严相逼”。一年之后就发生了“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 一、“九大”政治报告风波：“九届二中全会”高层冲突之前奏

1 9 7 1 年夏毛泽东南巡时，多次对省市负责人谈到 1 9 7 0 年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所谓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其中的一方是毛自称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一方就是后来所说的“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林彪向来是毛的坚定支持者，又是毛钦定的“接班人”，而陈伯达自“文革”开始以来一直是“中央文革”组长，是毛的“文革派”主将，为什么毛认为这两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人物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呢？

当时的官方文件宣称，林彪、陈伯达“一伙”的主要“罪行”是，在 1 9 6 9 年筹备召开“九大”期间，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份令毛不满的政治报告。对此，1 9 7 3 年 8 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的解释是：“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但是，究竟这份导致“无产阶级司令部”重大分裂的由“林彪伙同陈伯

达起草”的政治报告有哪些内容，却从未公布过。尽管官方文件不断强调这是林彪、陈伯达的“重要罪行”，但对这一报告草稿的真实内容却始终高度保密，不仅在毛泽东亲自领导、“四人帮”把持媒体全力掀起的“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未公布这一报告草稿，甚至在“四人帮”倒台后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继续批判中也不公布。这是一个反常现象。1971年林彪死亡后，为了批判林彪，毛泽东甚至硬着头皮批准下发了尖刻批判、侮辱他的“‘571工程’纪要”，何以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就一定不能公布？按常理来推断，一份为“九大”起草的政治报告草稿不可能比“‘571工程’纪要”更尖锐。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份报告提到的今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比毛泽东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更得人心，若公布这一观点的具体内容会对毛泽东非常不利。

其实，即便林彪和陈伯达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也不能说这种看法与毛泽东的公开说法有根本冲突。1967年8月16日，毛泽东与两位阿尔巴尼亚专家谈话时就说过：“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2），”此后他又多次作过类似表示。比如，在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过：“现在不是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3）。”如果毛泽东真的这么想，那么1969年春天召开“九大”时政治报告当然就应该着重讲经济建设了。然而，毛泽东关于“三年结束‘文革’”的说法倘若并非其真意，只是“虚晃一枪”，那么，提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的说法当然会令毛泽东不快。不过，在当年全国上下对毛泽东无限崇拜的政治环境里，恐怕没有人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而无条件接受毛泽东与林、陈之间的分歧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宣传倒是很自然的。

需要分辨的另一个问题是，林彪是否确实“伙同陈伯达起草”了这个报告，林彪在陈伯达起草这个报告时到底起了多大作用？上文提到的1973年周恩来的报告并未拿出确凿证据。最近，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披露：“陈伯达在领受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任务后，撇开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一个人天天往毛家湾跑，同林彪商量怎样写（4）。”当年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王保春则回忆说：“由于是林彪在党的九大会议上作报告，所以林彪就约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去他那里（毛家湾）谈了一下，以表示林委托他们三个代劳，报告内容由陈考虑，林彪就不多过问了。”“陈伯达回办公室后，很快拟了一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列了几个小标题，陈带着这个提纲，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回来改成总题目下面十个小题目……”陈伯达还对两位秘书说，不管“上海那两个”（指张、姚），“他们和我想的不一样”，他要自己写，并讲了他对起草“九大”报告的主题设想：“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主要的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就是说，经过了一场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产上的大跃进（5）。”

以上两种说法略有出入，一个说陈伯达“天天往毛家湾跑”，一个则只说陈伯达拟好提纲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又回来修改。不过，从这些文字看，林彪应是支持和赞同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的。虽然说“林彪就不多过问了”，陈伯达毕竟还是“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才回来修改的。

在林彪办公室（简称“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中，却又有另外的说法。林彪在准备“九大”报告时告诉秘书：“我向来不习惯念别人写的现成稿子，而只愿意自己顺口讲。因此，我想搞个平行作业，既准备一个正式发表用的稿子，又准备一个讲话用的条子。”林彪还说明：“我这次做口头讲话，还是用十二中全会讲话的那六个题目（6）。”

林彪所说的“十二中全会讲话的那六个题目”是：“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中国革命在世界上的作用；今后怎么办（7）。若从这六个题目看，林彪对“九大”报告的设想与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的主题就大不一样了。两人的想法既然不同，又如何“伙同”起草呢？后来，陈伯达起草

的报告被“中央文革”否决了，毛泽东决定改由康生牵头，张春桥、姚文元执笔重新起草。陈伯达还不甘心，又托叶群劝林彪好好看看他起草的报告稿。叶群向“林办”秘书们吩咐：在向林彪讲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稿时，不能讲得太细，以防林彪脑子一热，又对陈伯达的东西发生兴趣（8）。这表明，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写了些什么其实并不清楚。

显然，根据目前已经公开的材料，无法确定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和抱有何种态度。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林彪对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报告十分反感。据张云生回忆：林彪对张、姚起草的报告“根本不感兴趣”，“始终不感兴趣，一眼没看”，只注意毛泽东的批示和修改（9）。3月底，周恩来把经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的政治报告初稿批送林彪审定，林彪一字未看，就在稿子上批了“呈主席审批”，急得周恩来无可奈何（10）。林彪在“九大”会议上宣读张、姚起草的政治报告之前，并未看过报告的内容。汪东兴说：“由于林彪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满，在‘九大’上，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11）。”林彪甚至还对叶群说：“多念错一点才好（12）。”林彪对得到毛泽东肯定的张、姚起草的报告的厌恶之情，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这件事上，无论是林彪还是陈伯达，并没有什么“反党”主张或“反党罪行”。他们只不过是未能像张春桥那样善于理解毛泽东深藏心中的真实想法，又对深受毛泽东宠信的张春桥有所不满而已，结果林彪与陈伯达竟因此获罪。

## 二、“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所谓“八月逆流”

毛泽东在1971年夏的南巡讲话中曾挑明了他要打击林彪的真正原因：“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上反我”，“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13）。”在未公开的《姚文元日记》中，姚文元提到，毛泽东称“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了“八月逆流”。“八月逆流”到底“逆”了什么？至今未见任何相关资料公布于众，而这个钦定名称也从来没有见诸史书。

现在来看，所谓的“八月逆流”不过是出席中央全会的代表在小组讨论中发表自己的看法罢了。这些意见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拼命颂毛表忠，二是不点名攻击张春桥（认为他贬低毛泽东思想，不忠）。令毛泽东动怒的原因是第二点，即他所说的“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上反我”。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讲了话，会议的主持者是毛泽东。据高文谦披露，在林彪讲话前，毛泽东问林彪准备讲什么，林彪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毛泽东听了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捣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14）。林彪的讲话只是一段又一段地讲述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好像是官样文章，只有了解此前在8月13日中央宪法修改小组讨论会上的争吵内幕的人，才会敏感到有些话是针对张春桥的。但林彪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在讲话中确实没有点张春桥的名字，而且只字未提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总的看来，林彪的讲话显得低调。倒是汪东兴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调门高，强调要设“国家主席”，认为党内还有“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坏蛋”。陈伯达、陈毅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情绪也较为激烈（后来周恩来在大会上点了“二陈合流”，给陈毅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15））。

在毛泽东的眼里，林彪和与会绝大多数代表都把矛头对准张春桥，这就是有阴谋。其实，“九届二中全会”上出现“反张春桥”的形势应有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在1970年8月13日中央宪法修改小组讨论会上，张春桥与吴法宪发生了争吵。张春桥以宪法序言中已有类似内容为由，提议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是全国

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一句，后来又大讲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讲过“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个讽刺”一类的话（16）。在“九大”前后，对毛泽东的“三忠于”狂热达到了高潮，在这样的气氛中，张春桥的这些言论显然属于大逆不道，于是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高级干部们或是认为抓到了张春桥的“小辫子”，或是认为应当趁机表明自己忠于毛泽东的坚定立场。

其次，张春桥一贯支持造反、夺权，而第九届中央委员中的众多军队将领和老干部几乎无不身受“造反”、“夺权”之苦之害。张春桥支持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红纵”，“红纵”险些要了总后勤部长邱会作的命；广州军区的“造反派”“炮轰”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使黄在广州呆不下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也曾被“造反派”逼得躲到大别山里；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被一次次的“炮轰”、围攻整得焦头烂额；外交部长陈毅在“九大”期间也曾遭到以张春桥为后台的上海小组的批判围攻……这些人早就对张春桥有一肚子的怨气。

再次，按当时的观点看，张春桥历史上有“叛徒”嫌疑，上海因此发生过“炮打张春桥”事件，“九届二中全会”的与会代表们自然都知道。

最后，林彪及许多军队将领、老干部对江青的狐假虎威、颐指气使早已忍无可忍（林彪曾于1967年初“批判萧华”事件后的一天，因情绪失控而大骂过江青一次（17）；还有一次他还扬言要找枪，要“毙了她”（18）！1967年1月军队将领“大闹京西宾馆”时，黄永胜在发言中公开说：“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19）！”），但他们因为“投鼠忌器”而不敢直接反对江青。张春桥是江青的心腹高参，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最富有政治经验、最老谋深算的角色，打击张春桥，就等于是给江青一击。

总之，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九届二中全会”上各地区组都一致声讨“阴谋家”，形成了群情激愤的气氛，在毛泽东看来“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后来康生曾如此概括当时的形势：这次会议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20）。

依照中共党章，中央全会是全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一切意见均可在会上公开表达，一切大事均应由全会讨论决定，但事实上毛泽东早就把党改造成了他个人的“一言堂”。当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看出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对他那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很不理解”甚至强烈不满，发现继续推行他的“文革”路线的党内阻力非常大，这样的形势不利于他的“战略部署”时，立刻大动“天子之怒”。他重施故伎，利用个人崇拜气氛为他造就的绝对权威，公布了一份大字报“我的一点意见”，同时揪出陈伯达以“杀鸡吓猴”。在当时毛的个人权威被推至颠峰状态的情况下，这个“我的一点意见”几乎等同于一言九鼎的“圣旨”，众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们只有高呼“万岁”、“坚决照办”，谁还敢再说半个“不”字？

在后来公布的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中，毛抓住“九届二中全会”上党内高层议论是否要设国家主席一事发难。中央文件甚至声称，林彪以“设国家主席”为名要“抢班夺权”，而这又被解释成林彪最后“仓惶出逃”的原因之一。对这个“设国家主席”问题，王年一和何蜀已在“‘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一文中做过深入分析，这里只强调几个要点：

首先，当时毛泽东反对设国家主席，却讲不出任何正当理由；他只是因为不想担任国家主席一职，就反对设立国家主席这一职位。毛泽东抱持“朕即国家”的观念，完全把国家主席这一国家主权对内对外的最高代表当成虚设的可有可无的职位，任凭自己的兴趣决定取舍。而且，“九届二中全会”初期，毛泽东其实并未因中央委员中绝大多数人坚持“设国家主席”而动怒，他后来抓住“设国家主席”一事发难是另有权谋上的考虑。

其次，当时党内高层除了毛泽东本人外，都认为国家主席一职只能由毛泽东担任。“设国家主席”一议既非林彪首倡，也非林彪独撑。“九届二中全会”前夕，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此事时，只有毛泽东主张不设国家主席，而主张设国家主席的却有4票（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林彪）。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也都赞成设国家主席。硬把“设国家主席”一议说成是林彪个人的阴谋，并无根据。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公开提出如果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就由林彪当国家主席的，只有一人，即江青集团的“顾问”康生。但毛泽东却从未因此而批评康生。

再次，指称林彪赞成设国家主席就是想当国家主席，要“抢班夺权”，更无道理。周恩来也赞成此议，而且具备担任这一职位的党内资历，为什么对他却不提出相同的指责？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其实毫无根据，而证明林彪不愿当国家主席、甚至不愿当“接班人”的根据却有不少（21）。

林彪死亡后，中央文件说林彪把“设国家主席”作为反革命政变的纲领，完全是无稽之谈。在这个问题上，暴露出来的只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

### 三、毛泽东的“心病”：林彪地位上升

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指出：“毛泽东并没有真想把权交给林彪，选择林彪作为接班人，不过是为了打倒刘少奇的权宜之计。九大后，林彪在政治上羽翼丰满，尾大不掉，成为毛的一块心病（22）。”

林彪的“接班人”本来就是毛一手安排并强迫林彪接受的。“文革”中让军队“支左”、介入地方政治斗争，并由军队干部主持各地、各单位工作，使“一元化领导”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几乎全由军人所把持，这也是毛泽东的独创。之所以在“九大”前出现林彪地位迅速上升的局面，完全是毛泽东自己一手造成的。据《晚年周恩来》一书介绍：“林彪……非但基本上掌握了军队的局面，军委办事组几乎是他清一色的人马；而且由于当时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一把手多半是奉命支左的军队干部而在政治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俨然成为左右政局的一大势力（2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文化大革命”部分也有相同的看法和分析。

尽管林彪地位的迅速上升是毛泽东自己造成的，可是一旦毛觉得林彪似乎有“羽翼丰满、尾大不掉”之势，他又感到惴惴不安。习惯于大权独揽的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大权旁落”。当年，刘少奇是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他甚至亲自推荐并动员全党拥护刘担任国家主席；可是，一旦他认为刘少奇对他的最高权力构成了威胁，自己的“大权旁落”了，“接班人”在他眼中就变成了“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便要被拉下马来而且不得好死。“九大”召开前，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才刚刚被“摧毁”，毛泽东又一次为“大权旁落”担忧起来。他一贯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林彪这个“接班人”是军人出身，“九大”会场上满眼都是军人，苏联当时也抨击中国是“军事官僚专政”。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口头上称“九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心中想的却是如何对付“羽翼丰满、尾大不掉”的新任“接班人”林彪。毛后来在南巡中就说：“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24）。”其实谁也没有那样说过，“有人说”只是毛的一个借口而已，而且军权从来就被他抓得牢牢的。但他一旦起了疑心，就“疑心生暗鬼”了。

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后南巡时，反复谈到林彪等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25）。林彪死后公开传达的中央文件中，这个“要当主席”却被改换成了“设国家主席”，可能因为实在找不到林彪“要当主席”的证据，只好拿“设国家主席”一事代替。毛泽东真正不能容忍的，并不是“设国家主席”而是他疑心有人“要当主席”。对于自比秦始皇的毛泽东来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毛怀疑谁动了“要当主席”的念头，谁



就是“另立中心、另拉山头、另设司令部”，谁就成毛的打击对象。

其实，毛泽东指责林彪要“篡党夺权”，只不过是毛个人的疑心而已。林彪长期受着疾病的折磨，连“饮食男女，人之大欲”都没有了，实际上很少过问他分管的事务。据“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我在林彪身边工作了4年多，因为要‘讲文件’，差不多天天都能见他一面，所以可以说，我对‘文革’中的林彪并不缺乏了解。然而我亲眼看到的林彪，在‘文革’动乱中要么是遇事不表态，要么讲些‘绝’话，要么就是对他份内之责‘大撒手’。”以军委办事组为例：“林彪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实际上，他参加主持‘日常’军委工作的记录屈指可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把军委的‘日常’工作委托给了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叶帅‘靠边站’后，军内上层一时群龙无首，亏得有个以杨成武、吴法宪为正副组长的‘军委办事组’照应‘日常’军务，林彪则对他们的活动很少过问。‘军委办事组’改组后，黄永胜取代了杨成武。这个以林彪的‘老部下’组成的清一色‘办事’班子，叫人一看就感到有‘搞山头’之嫌。但那是毛主席钦定的，林又是毛可以信赖的‘接班人’，因此这个‘清一色’倒可成为抵挡一切‘复辟’梦想的一道屏障。林彪在名义上是‘副统帅’，实际上却是靠‘抓两头’：上头靠毛主席掌舵，下头靠有个可以办事的工作班子挡挡军内日常事务。”“军委办事组自1967年夏成立，到1968年3月改组，再到‘九大’后正式成形，直到1970年10月我调离‘林办’，我没见到一次林彪接见军委办事组的全体成员，没有听到他对军委办事组的全面工作给予一次像样的指示。我甚至认为，不管是杨成武或黄永胜领衔的军委办事组，他们在什么地方‘办事’又怎样‘办事’，林彪从不过问。”“从1967年到1970年，林彪在住地毛家湾的会客厅只召见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四员大将一次，谈的仅仅是怕苏联趁我国庆对北京实施突然袭击的事，而且只有20多分钟。”“黄永胜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和总参谋长前后，林彪只见他两次。”“吴法宪可算林彪的亲信，但自从军委办事组改组后，林彪在住地从未单独接见过他。”“……林彪与李作鹏并无‘私交’。我在‘林办’任职四年，只是在1966年9月海军内部出现纷争，林彪偏向了‘高举’、‘突出’、‘有干劲’的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因而在大会堂接见过一次李作鹏夫妇。从那以后，林彪与李作鹏再无单独接触。”“邱会作在‘文革’期间从没得到单独面见林彪的机会。”“又有人说，林彪控制‘军委办事组’，是通过他的老婆叶群……依我看，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叶群做坏事，林彪确实有责任。但叶群打着林彪的招牌，在外边胡作非为，林彪并不全部知情。他从叶群嘴里听到一些，又是经叶群用花言巧语伪装了的。‘林办’的工作人员直接受叶群控制，眼见处于病态的林彪受叶群摆布，但无能为力。”“事实上，叶群虽为‘军委办事组’成员，但她几乎从不参加‘军委办事组’的会议。‘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出了成绩有她一份，出了是非她不不承担任何责任。‘军委办事组’天天忙于处理的‘三支两军’工作、部队战备训练以及人事调整等问题，叶群从不参与正式讨论研究（26）。”

林彪在1968年10月26日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报告中也承认：“……整个两年多的工作，主要是毛主席领导的，具体执行主要是中央文革，特别起作用的是江青同志、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其他同志。而我呢，老实讲，就是没有做多少事。我也并不是故意偷懒，就是身体不好，不能够做多少事情。所以实际情况了解的不多，工作也做得不多（27）。”即便如此，毛泽东仍然怀疑林彪要“篡党夺权”，如此则林彪在劫难逃了。

#### 四、林彪是如何被逼上绝路的？

毛泽东是个权谋大师，在送林彪坐上“接班人”高位之时，就已经决定尽快把林彪从“接班人”的位置上拉下马来。熟读古籍的毛很善于运用古代帝王的欲擒故纵手法：在他准备对林彪“开刀”之前，却当面向林彪许诺，声称自己准备两年后交班给林彪（28）。这样的把戏毛泽东以前也多次玩过。1965年毛泽东部署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场批判将置彭德怀于

死地，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开发表之前，毛泽东居然还当面宽慰彭德怀，甚至说出“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这样的话（29）。“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制订的打倒刘少奇的“战略部署”已全面展开，“炮打司令部”的号召传遍全国，可是1966年9月14日毛泽东还在刘少奇的检讨书上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10月25日毛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30）。”林彪对毛泽东的故伎重施自然有数，但林彪既不象彭德怀那样据理力争，也不象刘少奇那样认真检讨，而是采取他独具特色的对策：一顶二拖。于是，毛泽东为了达到打倒林彪的目的，只得想方设法“引蛇出洞”、“轰蛇出洞”，展开了一系列“把林彪逼上绝路”的部署。

### （一）控制中央组织、宣传大权

1970年11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它指出：“为了党在目前进行的组织宣传工作，实施统一管理，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中央组织宣传组设组长一人，由康生担任。设组员若干人，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同志担任。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的工作，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单位的工作（31）。”无疑，这个决定是毛泽东个人作出的，也只有他才能作出。目的就是为了把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同时削弱和钳制林彪。什么“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其实就像“中央文革小组”一样，还是在毛泽东一人的领导和控制之下。

这个“中央组织宣传组”名义上的组长是康生，但康生其实自“九届二中全会”后就称病不起，不再工作。该组组员李德生此时身兼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总政治部主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等重要职务，此后不久（1971年初）又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的这种职务安排也是毛泽东的一大“创造”），因此他在“中央组织宣传组”纯属挂名。实际上中央组织和宣传大权落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中。中共中央明令把中央的组织宣传大权交给几个人，这是中共党史上“史无前例”、绝无仅有的一件大事。“九大”后没有“中央文革小组”了，新成立的这个“中央组织宣传组”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借尸还魂”，而且权力更大了。江青等人凭借这一大权，做了许多坏事。

### （二）“大批判开路”

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通知”，掀起了全国性的“批陈整风”运动，主要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唯心主义先验论”。批“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告诉国人，刘少奇“司令部”倒台之后阶级斗争依然存在，新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又出现了；批“唯生产力论”是针对陈伯达的“九大”政治报告草稿，以打消人们以为“九大”后会结束“文化大革命”进入经济建设阶段的念头；批“唯心主义先验论”则是批判曾得到“八届十一中全会”确认的“天才论”。

毛泽东在黄永胜等人的检讨上批注了一段批判陈伯达的话：“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32）。”毛泽东过去长期任用陈伯达作自己的政治秘书，并让陈担任为“文化大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倘若陈伯达确实早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毛泽东却一直重用他，岂不是故意帮助敌人在最高决策层埋藏“定时炸弹”？事实上，毛为陈伯达加的这些“罪名”，恐怕毛自己也不见得相信，他只不过是整垮政敌而不择手段地给昔日的亲信陈伯达罗列“罪名”而已。

这一系列批判表面上针对的是陈伯达，实际上都是针对林彪的。这是毛惯用的“大批判开路”策略。在打倒前一个“接班人”刘少奇之前，毛泽东就在全中国开展了对“三家村”、对前北京市委和中宣部、文化部的“大批判”运动。这次的“批陈整风”运动实质上就是为打击林彪而制造舆论。在1971年4月15日至29日召开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上，对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批判终于扩大成了对“中央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5人“政治上的方向、路线错误”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错误”的批判。这5人都是林彪倚重的军方主要领导人，此时“批陈整风”运动真正的矛头所向就十分明显了。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谈话中批判了林彪颂扬毛的“四个伟大”的说法，也就等于不点名地批判了林彪。经毛泽东批准，“毛主席会见斯诺的谈话”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0〕39号）”的形式下发全党。毛藉此向全党暗示，自己对林彪的态度变了（该文件特别注明：已经毛主席审阅）。“文革”初期毛泽东心安理得地接受“四个伟大”的颂扬，唯恐“个人迷信”之风不烈，如今又改口说“四个伟大”讨嫌，实在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黑是白全由他说了算。

1971年2月18日，周恩来将外交部编印的《外事活动简报》“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送毛泽东阅。该简报的第（四）条提到，加西亚在井冈山参观时对讲解员闭口不谈南昌起义和朱德率部上井冈山这两段史实提出意见，认为这样讲外国人不容易理解。毛泽东批示：“第（四）条说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33）。”就在一年多以前的“九大”上，周恩来在大会重点发言中公开宣称：“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34）。”当时周恩来的这个发言贬低朱德、吹捧林彪，明显歪曲史实，吓得林彪赶紧打断周恩来的话：我林彪没什么，一切都是毛主席，我如果跟着贺龙、朱德早就完了，没有今天。为了表示自己对毛的诚惶诚恐，林彪还当场哭了起来（35）。“九大”上周恩来发表歪曲史实、吹捧林彪的讲话，当时毛泽东的态度是对周恩来的讲话报以热烈鼓掌。到了1971年春，毛认为打倒林彪的时机快来了，于是又一反过去的态度，假惺惺地要求调整“文革”以来贬低朱德的官方说法，“作正确解说”。

### （三）削弱林彪的军事指挥权

为了打击林彪，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削弱林彪的军事指挥权。毛后来自鸣得意地说：“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36）。”

所谓的“甩石头”是要打击林彪等人的威信，把他们“搞臭”；“掺沙子”一事表明，毛泽东完全不信任军委办事组，说“土太板结了”，就如同当年说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一样；“挖墙角”（又作“挖墙脚”）则更是无中生有把北京军区看成了林彪的“墙角”和“林彪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37）。毛泽东最担心的是首都北京发生政变，因此对北京军区最不放心的，要设法“换马”。当时北京军区的第一政委是李雪峰，北京军区司令员是郑维山。由于毛对此二人有所猜忌，就故意把由李雪峰、郑维山主持的“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会议的简报钦定为“反革命的”，然后以此为借口改组北京军区，使李雪峰、郑维山二人遭受长期迫害。

### （四）“敲山震虎”，逼林彪认罪

毛除了用了这“三板斧”之外，还通过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检讨的批示，“敲山震虎”，刺激林彪，逼林彪认罪。“九届二中全会”后，黄、吴、叶、李、邱都被迫写了书面检讨，毛泽东在这些检讨上作了批示并将批示下发党内，其中一些语句广为人知。例如，毛对吴法宪检讨的批示是：“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38）。”毛对叶群检讨的批示是：“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39）。”再如对刘子厚（时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前的河北省省长）所作检查的批示是：“上了陈伯达的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3月19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有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上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40）。”此批示前边还有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此件留待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一阅（41）。”

从这些批示中可以看出，毛用的是讽刺挖苦、“上纲上线”、“揪住不放”等手法，对黄、吴、叶、李、邱等人的态度甚至比“文革”初期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态度还要严厉，堪称“史无前例”。而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了与黄、吴、叶、李、邱相同观点的汪东兴检讨的态度却迥然不同，毛信任依赖汪东兴，对汪的言行就“轻轻放下”了。

林彪个性强，自尊心重，对毛泽东又很了解，他很清楚毛泽东的指责无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这种莫名其妙的罪名，他即便主动承认也未必有好下场。当年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国家主席刘少奇不都是勉强承认了毛泽东强加的“罪名”并且一再检讨，最后仍然死于非命吗？不过，据林彪的秘书李文普回忆，“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曾让新调来的秘书王焕礼代写过检查（42），内容不详，毛泽东是否就此作过批示也得而知。这个检查显然是毛、林二人没有当真的。1971年2月20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报送学习讨论其关于批陈整风“重点在批陈”指示的情况报告，毛泽东作了措辞严厉的批示，并且破天荒地将此件只批给“周、康阅后，退军委”（43），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照例批给林彪。这显然也是在刺激林彪，逼林彪认罪。

#### （五）拒绝与林彪见面、不给转圜的余地

整人时拒绝与被整者面谈，不听申诉，不听解释，强调“只有低头认罪才是你的唯一出路”，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手段。“文革”前毛泽东整总参谋长罗瑞卿时，罗瑞卿以为其中有误会，想与毛泽东、林彪见面，把事情说清楚，被周恩来坚决阻止（44）。罗瑞卿有口难辩，在“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下被逼得含恨跳楼，自杀未遂。毛泽东对林彪还是用的这一套，然而毛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相反，毛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说：“对林还是要保……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这分明是撒谎。

据李文普回忆：“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曾要求面见毛泽东，谈一谈，但毛泽东长时间不作答复。林彪个性很强，从不服软，两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林彪此后不愿住在北京，经常住在苏州、北戴河（45）。另据官伟勋转述一位“林办”秘书的回忆：林彪找毛泽东很多次，“就是见不上。后来没办法才找江青，他最讨厌江青，但又没办法，因为想通过江青去见毛主席，”就在这时江青让林彪去照相，“林为了见毛主席赶紧去，走得急，脸都没刮，到了钓鱼台，现借江青秘书的刮脸刀刮了刮，照片拍了，但还是没见上毛主席（46）。”

#### （六）南巡“打招呼”、宣布“逐林令”

毛泽东习惯于以“打招呼”来强行统一思想。所谓的“打招呼”就是非正式地颁布“最高

指示”，全党与全军干部只许恭听，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更不“允许发表反对意见”，对毛的意见谁想不通，必须赶紧“转弯子”。毛泽东这一次为了打倒林彪，事先不开中央会议，不发中央文件，干脆抛开中央领导集体，凭着他个人的“绝对权威”，于1971年夏南巡“打招呼”。

此次南巡后共28天，在途中毛约见各地军政大员，讲话13次。讲话中充满了给林彪“上纲上线”、“定性定罪”的话：“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47）。”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一再诬指林彪等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反革命政变”的纲领之一是“要当主席”（48）。然而，因为说林彪“要当主席”毫无事实依据，太“莫须有”了，所以“九·一三”事件之后，当毛泽东审定并批准中央公布的此前他的南巡讲话时，又自行把当时讲话中对林彪“要当主席”的指控改成了林彪欲“设国家主席”。毛泽东的蛮横无理、任意诬陷、信口捏造，由此可见一斑。

这次南巡讲话是毛泽东欲打倒林彪的宣言书、挑战书、逐客令（逐林令）。当时的海军政委李作鹏听到毛的南巡讲话后，把它概括为3点：庐山的问题没有完；上纲比以前更高；矛头指向首长（林彪）。他的概括一点也没有错，林彪当然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不在中央高层内部讲，不对林彪当面讲，党中央的主席背着党中央的副主席，背着中央，到下面去煽风点火，动员打倒他自己钦定的“接班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但毛同时又假惺惺地声称：“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不要公开的去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不要像我对你们说的这一套（49）。”如此作为的毛泽东居然还道貌岸然地提出了“三要三不要”（“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究竟是谁在分裂党内高层，谁在搞阴谋诡计，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毛泽东把林彪逼到这一步，林彪已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彼时彼地，林彪还能怎么办？低头认“罪”显然是行不通的，彭德怀、刘少奇不是都低头认“罪”了吗？但他们的下场如何？何况此时的林彪不是1959年的彭德怀（那时的彭德怀比他年轻、身体也好），也不是1966年的刘少奇（刘少奇比他理论修养更高、政治斗争经验更丰富），林彪身患重病，经不起“认罪”后必不可少的长期折磨，于是不想“认罪”，只想“认命”，“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50）。”但叶群、林立果又不愿意认命，于是就有了林彪被逼出逃的“九·一三”事件。

对“九·一三”事件的真相，已有一些文章指出了官方解释中的很多破绽，为此提出了一系列疑问。1971年9月13日凌晨，当毛泽东、周恩来获悉林彪夫妇准备乘坐256号专机离开北戴河之后，究竟做了些什么事，至今仍然扑朔迷离。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提供了一个新疑点：林彪“在出逃途中还曾一度萌生了打退堂鼓的念头”（51）；在林豆豆告发之后，中央可以阻止林彪的出走而未“全力阻止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可以阻拦256号专机起飞而“没有人出来拦阻”……（52）。也许，逼林彪这样出走本来就是毛的“战略部署”。

林彪的出逃宣告了毛泽东所谓“团结、胜利的九大路线”的破产，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也是对毛泽东及其荒谬绝伦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说法的致命一击。林彪的出逃与惨死异国他乡，粉碎了毛泽东多年来精心编织的“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团结、胜利的九大路线”等神话，在亿万炎黄子孙的心中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大地震”，唤起了许多人的觉醒。可以说，256号专机坠机在蒙古温都尔汗的爆炸声，敲响了“文

化大革命”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丧钟。

注释：

- 〔1〕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第4、345页。
- 〔2〕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99页。
- 〔3〕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209页。
- 〔4〕出处同注〔1〕，第269页。
- 〔5〕王文耀、王保春，“关于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2期。
- 〔6〕张云生、张丛坤，《“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第463页。
- 〔7〕出处同上，第456页。
- 〔8〕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第211页；另见张云生、张丛坤的《“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第467页。
- 〔9〕出处同注〔6〕，第467—468页。
- 〔10〕出处同上，第469—470页。
- 〔11〕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第17页。
- 〔12〕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198页。
- 〔13〕出处同注〔2〕，第1595、1594页。
- 〔14〕出处同注〔1〕，第291页。
- 〔15〕出处同注〔1〕，第364页。
- 〔16〕出处同注〔1〕，第286页。
- 〔17〕出处同注〔6〕，第131—133页。
- 〔18〕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211—212页。
- 〔19〕出处同注〔1〕，第195页。
- 〔20〕出处同注〔1〕，第300页。
- 〔21〕详见王年一、何蜀的“‘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载网络杂志《华夏文摘增刊224期·文革博物馆通讯70期》，2000年7月13日出版。
- 〔22〕出处同注〔1〕，第272页。
- 〔23〕出处同注〔1〕，第275页。
- 〔24〕出处同注〔2〕，第1594页。
- 〔25〕出处同注〔2〕，第1594—1598页。
- 〔26〕出处同注〔6〕，第299—305页。
- 〔27〕载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
- 〔28〕出处同注〔1〕，第300、303、313页。
- 〔29〕《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8页。
- 〔30〕出处同注〔2〕，第1448、1451页。
- 〔31〕《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99—300页。
- 〔32〕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14页。
- 〔3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37页。
- 〔34〕“周恩来等九位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大会上的发言”，四川人民

出版社革命委员会翻印，1969年5月7日。

〔35〕出处同注〔1〕，第279页。

〔3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46—247页。

〔37〕见1971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通知，转引自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第410页。

〔38〕出处同注〔36〕，第137—139页。

〔39〕出处同注〔36〕，第143—146页。

〔40〕出处同注〔11〕，第77页。

〔41〕《大动乱的年代》，第415页。

〔42〕李文普，“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载《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

〔43〕出处同注〔36〕，第208—209页。

〔44〕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第213页。

〔45〕出处同注〔42〕。

〔46〕出处同注〔18〕，第242—243页。

〔47〕出处同注〔2〕，第1594—1598页。

〔48〕出处同注〔2〕，第1595、1596页。

〔49〕出处同注〔2〕，第1596—1597页。

〔50〕金春明主编，《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32页。

〔51〕出处同注〔1〕，第345、347页。

〔52〕出处同注〔1〕，第343、344页。

~~~~~

【学术争鸣】

“九一三”毛周是否逼林出逃？

• 陈晓宁 •

目前，有一些论者认为，在1971年9月12日晚，是毛泽东、周恩来有意逼迫林彪出走国外。笔者对此持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愿在此和大家探讨。

◇ 毛泽东当晚的作为

毛泽东是在9月12日下午16：05乘坐南巡的火车到达北京站的。然后，就坐汽车回中南海。毛泽东回到中南海后又干了些什么呢？据汪东兴回忆，由于毛泽东自杭州动身到现在，已经3天没有休息好了。所以，毛、汪之间互相建议对方睡一睡。所以，估计毛泽东此后很可能休息睡觉了。对毛泽东来说，毕竟提心吊胆了不少日子，预想的危险都没有发生，也许是自己多虑了，现在最终还是平安返京了嘛，的确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那么，自12日下午毛泽东返回中南海，到13日凌晨0：32分（即：林彪一行所乘256飞机从北戴河机场强行起飞的时刻），毛泽东是否参与了处理林彪事件呢？据汪东兴和张耀祠的回忆，都是没有。

汪东兴在《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中写道：

13日零点32分，我接到张宏从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说飞机已经起飞了。与此同时，林立衡也打电话来对我说：“听到飞机响了，好像是上天了。”我对她说：“你报告得迟了一点。”她对我说：“刚听到飞机声。”……我立即打电话给周总理，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也从中南海南楼到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我叫张耀祠同我一起去，我说，你要去主席那里接电话。我们和周总理几乎是同时到了毛主席那里。

我们从汪东兴的这段回忆中可以看到，直到林彪一行所乘坐的256飞机强行起飞后的一段时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实际上，从汪东兴接到来自北戴河林立衡方面的检举电话开始，汪东兴都是直接向身处人民大会堂的周恩来请示、汇报的，而没有向毛泽东通报。

另外，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张耀祠在《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是夜23点40分，张宏再次向我报告：“他们已经调汽车了”。我问：“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张宏说：“准备好了。”我说：“他们走时，你们要跟上他们，要特别注意他们去的方向。”

这时还没有报告毛主席，中央还没有指示，我只能向张宏交待注意去的方向。

我放下电话，“叮铃……”，又是张宏的电话，他报告说：“林彪他们出来了，刘沛丰手提四个皮包先上车……”

我们从张耀祠的这段回忆中可以看到：直到林彪一行准备出门上车去往山海关机场的时刻，张耀祠“还没有报告毛主席”，毛泽东还没有接到有关当晚林彪方面的情况报告。

由于汪东兴和张耀祠都属于随侍毛泽东的角色，从9月12日晚到13日凌晨的几乎所有外界电话、消息都是通过他们向毛泽东转达的。所以，汪东兴、张耀祠对于自己“在什么时刻将林彪方面的异常情况通知的毛泽东”这一重要问题，应该是记忆深刻的。

所以，只要汪东兴、张耀祠不故意撒谎，则他们的回忆应该是可靠的。而汪东兴、张耀祠有没有可能在这一问题上，为了给毛泽东开脱责任而故意说谎呢？笔者认为这不大可能！因为，先不谈他们两人在此问题上统一口径“串供”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只要想一想，如果汪东兴、张耀祠通过这种做法来给毛泽东开脱责任，这就等于把处理林彪事件的所有责任都推给了周恩来一个人。但是，对于一贯故意在暗中搞“抑毛、扬周”、用周恩来当作贬毛之后的“新精神支柱”的当局来说，这样故意损害“敬爱的周总理”的光辉形象、为毛泽东开脱责任的行为，即使汪东兴、张耀祠有意，当局也决不会允许。所以，笔者认为，汪东兴、张耀祠不大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撒谎、为毛泽东遮掩。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回忆应该是可靠的。

这样一来，毛泽东本人实际上在林彪登机之前根本没有接到相关情况的报告（那些情况都是直接报给了周恩来）。所以，毛泽东本人根本没有介入林彪登机之前的事件处理工作。因此，说“毛泽东故意逼迫林彪出逃国外”就是没有根据的。

实际上，在1971年9月12日晚到9月13日凌晨0：32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之间这段时间，在北京方面处理林彪问题的核心人物是周恩来。在这一时间段内，一系列重大的处理决策都是由周恩来一个人做出的。现在我们需要研究的就是周恩来是否蓄意逼迫林彪出逃国外。

◇ 周恩来当晚的一些重要行止

9月12日下午5点左右，周恩来起床，吃完饭后，带上他的文件包去人民大会堂，准备晚上开会。会前，他一个人在大会堂东大厅的北小厅翻阅文件。会议是晚8点开始，地点在福建厅。参加会的人员是部份政治局委员和有关的部长们，内容是讨论即将提交四届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

大约将近晚10点，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在刘吉纯陪同下向北戴河警卫部队负责人姜作寿、张宏报告：“叶群、林立果要带着首长逃走。他们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

大约晚10点许，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会议的周恩来接到汪东兴转达的来自北戴河林立衡的那个报告，周恩来命令北戴河方面：“继续观察，随时报告。”然后，周恩来返回会场继续开会。这是周恩来接到的来自北戴河林立衡方面的第一次报告。

大约晚10点40分，周恩来又接到北戴河方面的报告：林立衡又报告，她听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这是周恩来接到的来自北戴河林立衡方面的第二次报告。

周恩来接到林立衡这个电话后立即命令吴法宪了解三叉戟飞机的情况。吴法宪向空军副参谋长胡萍了解情况，并转达周恩来的命令：“此飞机马上飞回北京，不准带任何人回来”。胡萍谎称飞机发动机油泵坏了，飞不回来。周恩来重申，飞机修好后，立即飞回北京，不准带任何人来京。

周恩来追查256三叉戟飞机的事，由胡萍经过周宇驰报告给林立果。

大约晚11点22分，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叶群盘问飞机及行程的事。周问叶群说：“林副主席好不好呀？”叶群回答：“林副主席很好。”周问叶群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先说不知道，稍微顿了一下后，又改口对周恩来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是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周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叶群回答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周说：“晚上飞行不安全。”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周恩来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周恩来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周恩来提出要去北戴河，这一下子叶群警觉了，叶群劝周恩来不要到北戴河来，对周恩来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周恩来后来对身边人员说：这时他才断定北戴河那里确实有问题，林彪可能要跑。为防意外，周恩来给李作鹏打电话命令他：这架飞机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4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大约晚11点40分，叶群和李文普到林彪的客厅，林彪对李文普说：“今晚反正也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东西，现在就走。”出了客厅，叶群对李文普说：“快点调车，越快越好。”叶群又对李文普说：“快点吧！什么东西都不能带了，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了。你快去调车。”很快，在叶群卧室，林立果又对李文普说：“老李，快点吧！有人要来抓首长。我给周宇驰打个电话，你在这里看一下。”

大约晚11点55分，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李文普一行登上了开往北戴河机场的汽车。

9月13日晨0：32，256三叉戟飞机在北戴河机场强行起飞。

依据以上的时间表进行一下分析。我们先来看晚10点许，周恩来接到林立衡第一次报告后的举动。他的行动是：命令北戴河方面“继续观察，随时报告”。然后，周恩来返回会场继续开会。

周恩来的这一举动很值得我们玩味，因为它至少说明了以下3个问题：

1、这个举动更进一步说明了，周恩来、毛泽东方面在此前，并没有得到有关林立果谋杀毛泽东，或者想南逃的情报。因为，如果周恩来此前得到过有关林立果谋杀毛泽东、或者想南逃的情报。那么，现在这个新情报足以说明事件有了新进展，对手酝酿着新的重大举动。则周恩来现在就会立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紧急思考并处理这一新事态。他怎么可能还有心思继续开那个无关紧要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会议！（在以后的时间，在事态逐渐发展以后，这个会议的确就被终止了——那个时候才说明了周恩来没有心思开这个会了）。

2、说明了周恩来对林立衡的报告是不相信的。林立衡是这样向北戴河警卫部队负责人姜作寿、张宏报告的：“叶群、林立果要带着首长逃走。他们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面对林立衡这样一个令人震惊却又没头没尾的报告，周恩来是很难相信的。因为，在没有充分讲明原因的情况下，谁会相信副统帅会逃跑？建国以后从没发生过高级领导人逃跑的事件，让周恩来如何相信林彪要逃跑？周恩来很可能在当时认为这是林立衡和家里又闹家庭纠纷了（此前有先例）。所以，周恩来对林立衡的这个报告是不相信的。所以，他又返回去参加会议。否则的话，如果周恩来真的相信林立衡的报告，那么，面对这么重大的突发事件，他同样是没有心情继续开会的。

3、至少到此时为止，周恩来还没有什么陷害林彪的阴谋。因为，假如周恩来有陷害林彪之心，面对此突发事件同时也是突然闪现的陷害林彪的“机遇”，他是应该立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紧急思考一下他的“陷害阴谋”的，他同样是不会有心思继续开会的。

从晚10：40左右林立衡打来第二个报告电话开始，周恩来就开始真正有些不安了，他开始有些将信将疑了。

面对一个他以前从没预料到的重大情况，特别是涉及到副统帅的问题，他更要谨慎了。周恩来的确需要进行一下对林立衡报告的核实工作。他下面就是在做这项工作。周恩来开始进行了解情况，并开始发布一些命令了。他采取的行动可以见以上的时间表。

这些行动都是正当的、正常的，看不出什么“阴谋逼迫”的痕迹。

比如：他屡次查飞机，这是因为，既然林立衡报告了北戴河有飞机，周当然要核实一下，看看林立衡的报告是否准确；他命令飞机立刻飞回北京，这当然是因为林立衡报告林立果要带林彪逃走，而想逃走当然需要乘坐飞机，如果将飞机飞回北京，当然就断了这条逃走之路。这种措施也很必要。

至于周恩来给叶群打电话，当然也是要了解一下叶群方面的情况。这么重大的事情，毕竟不能只听林立衡的一面之词，的确需要在叶群那边试探一下情况。当然，周、叶交谈中，周恩来还是很精明的，明知道北戴河有飞机，仍然旁敲侧击地试探叶群。周恩来后来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时他才断定北戴河那里确实有问题，林彪可能要跑。可见，前面那些举动，都是周恩来在试探，因为，他需要了解情况，要核实林立衡讲的是不是真实的。

当然，这时候周恩来也仅只是开始真正怀疑，他并没有能够肯定确信林彪要跑。因为，此前叶群等就放过风，说林彪要去大连，所以，即使以上的发现促使周恩来有所怀疑，但谁能保证林彪不是要去大连呢？也许他只是想坐飞机在天上转转呢？

从周恩来采取的这些措施和他的将信将疑，我们仍然看不出周恩来有什么阴谋和打算逼走林彪的企图。

随后，周恩来又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下令256飞机只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应该说，这个命令既是正当的，也是很有用的。如果不是有什么意外的话，是能够阻止林彪的出走的。

再有，我们在事后看来，阻止林彪出走的尝试，其实是很有可能成功的，比如：8341部队的副大队长于仁堂等人曾抢在林彪一行出发之前，先期赶往机场，企图阻止飞机起飞，可惜被林彪座车高速超过。在林彪座车出发后，8341部队的大队长姜作寿、中队长萧奇明等人也曾带30多名警卫人员在后面紧紧追赶。最先追到机场的于仁堂等人到达机场时，仅仅比林彪一行晚了几分钟。从这些举动来看，周恩来还是真心要阻止林彪出走的。否则，他可以设法耽误更多的机会，拖延更多的时间，而不是仅仅只相差几分钟才未能阻止林彪的出走。

总之，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不出周恩来的行为有故意逼迫林彪出逃国外的迹象。

◇ 没能阻止林彪出走的原因

当然，对于“周恩来是否故意逼迫林彪出走”的问题，现在存在着一个很有力的质疑，那就是：既然林立衡早在9月12日晚10点许就已经向中央报告了林彪可能出走的情况，直到9月13日凌晨0：32分，256飞机强行起飞的时刻，这之间足足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如果周恩来措施得当、有力，那么，想阻止林彪一行的出走，时间还是充分的。那么为什么最后还是没能成功阻止林彪一行出走呢？

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周恩来怀疑、犹豫、迟疑。那么，为什么经过林立衡报告，并经过一些核实后，周恩来还是有很深的怀疑呢？关键在于林立衡在报告时，故意没有讲清“林立果要带林彪出走”的原因！

据姜作寿回忆，林立衡是这样向北戴河警卫部队负责人姜作寿、张宏报告的：“叶群、林立果要带着首长逃走。他们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关于林立衡的这次检举报告的具体内容，流传有多个版本，除了这个姜作寿版以外，还可以举香港《镜报月刊》署名萧萧的文章《林彪女儿大胆披露父亲出走详情》中的版本：“豆豆跑到8341警卫团报告：‘叶群、林立果要把首长弄走，你们一定要保护好首长。’”

尽管以上的说法有差别，但并不影响讨论的结果。在林立衡的这个检举报告中，林立衡恰恰没有讲明林立果、叶群为什么要带林彪逃跑！

笔者在前面讨论过，毛、周方面此前完全没有关于林立果杀毛和准备南逃的情报。假如林立衡在检举报告中明确地这样告诉中央：“林立果曾经策划谋杀毛泽东，但是现在计划失败了，只能逃跑去广州另立中央。”如果林立衡是这样报告的话，那么，林立果带林彪逃跑的理由就是非常充分的。则周恩来就很可能相信林立衡的话，并相应地采取最坚决的措施。

但是，林立衡却只说“半截话”，偏偏故意不讲清“林立果曾经实施过谋杀毛泽东的行动”这个事由，这让周恩来如何相信林立衡的检举呢？堂堂的副统帅，为什么要逃走？虽然周恩来知道毛、林之间自庐山会议以后的冲突，但这也不至于造成林彪出逃呀！自建国以后，党内斗争就没有停过，但是，从没发生过高级领导人逃跑的事件，谁会相信林彪会逃跑呢？再有，周恩来对林彪的品行和性格也是熟悉的，无缘无故地、没头没脑地说林彪要跑，让周恩来如何相信？

正是由于林立衡始终不肯把“林立果要带走林彪”的原因向周恩来解释清楚（同时也因为毛、周方面此前完全没有林立果方面杀毛和南逃的情报），所以，在周恩来看来，林立衡的这个报告非常耸人听闻。耸人听闻到了什么程度呢？那就是不但周恩来不相信这个报告，就连直接听到林立衡报告的姜作寿本人也不相信。姜作寿回忆当初听到林立衡报告时的感受说：“她（林立衡）所讲的，使人不能相信。像林彪这样的高级领导人，怎么可能跟着老婆、孩子去香港呢？”。

此外听到相关信息的林办的工作人员也不相信林立衡的话。比如：林立衡向林彪的卫士长李文普提醒过多次有关“林立果可能要带林彪出走”的事，但是，林立衡同样始终不肯讲出证据来，所以，李文普显然也不相信。林办秘书、后来曾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的宋德金也是类似，他曾回忆道：

大约9月10日，八三四一部队警卫刘副科长把我拉到僻静处，悄悄地对我说：“豆豆（林立衡）说，主任（叶群）与林立果要挟持首长（林彪）外逃，怎么办？”我听了之后，大吃一惊。继之又静了下来。我说：“不会吧？这怎么可能呢？或许是他们家庭内部问题。”

大家都知道林彪一家内部有家庭纠纷，有的时候闹到要死要活的地步（比如，林立衡就曾自杀未遂多次）。所以，上到周恩来，下到林办工作人员都很自然地将林立衡的这个报告理解为家庭纠纷引起。所以，一句话，在当时在后来的恶性事件还没有发生的时刻，从林办工作人员到北戴河警卫部队的姜作寿等人再到周恩来，没有一个人真正相信林立衡的报告，顶多是将信将疑。

正是由于周恩来从根子上说不相信林立衡的这个报告，所以，他采取的措施也就不可能最坚决。他始终在怀疑，在犹豫。

正是由于周恩来的犹豫，很多非常有效的、果断的措施没有实施。比如：可以用汽车堵住去往机场的路，甚至可以在机场设置障碍物，阻止飞机起飞（山海关机场作为海军航空兵的机场，这种工作在此前的战备演习中应该搞过，应该不成问题）。

但是，这些有效的措施都没有实施。这是为什么呢？笔者分析认为：因为，如果这样的坚决的措施一旦实施，周恩来可就把林彪彻底得罪了。可是，周恩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著名的老好人，在为人处世上八面玲珑，谁也不想得罪，一贯在各派势力之间搞平衡。在还拿不准方向时，他怎么可能果敢地去干得罪人的事呢？现在，如果他把那些最坚决、最强硬的措施使用出来，他周恩来面临的局面将是：拿着将信将疑的情报，去干百分之百得罪副统帅的事。他周恩来怎么会干这种事呢？万一最终一切只是一场误会，比如：林彪只是想去大连，甚至只是到天上转一转。那么，他周恩来将来还怎么和副统帅相处呢？所以，对林立衡的报告怀有深深怀疑的周恩来始终犹豫，观望。那些最有效的、但也彻底得罪人的措施他是下不了决心实施的，因而也就错过了阻止林彪出走的机会。

◇ 为什么林立衡不说出原因

现在还可以讨论一下：为什么林立衡在检举时始终不肯向周恩来以及 8341 部队领导人姜作寿等人说明“林立果要带林彪逃走”的原因呢？

林立衡不但在向中央报告时，不肯讲清“林立果要带林彪出走”的原因，即使面对李文普等林办内部人员追问她要证据的时候，也不肯正面回答。对于这个问题的原委，我们没有见过林立衡本人的解释。

据笔者分析认为：林立衡故意只对外人说出“林立果将要带林彪出走”这一结果，却故意不说明这一惊人举动的原因。这一方面是因为：如果林立衡不向别人讲清“林立果将要带走林彪”这个严重后果，则警卫部队是不可能去、也没有理由去阻止林彪的外出行动的。林立衡想救父亲，她就必须要把这个严重后果告诉警卫部队，告诉周恩来，以便让他们采取措施制止林彪出走；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林立衡同时对大家，尤其是对周恩来方面讲清“是由于林立果实施杀毛计划失败，才导致要带走林彪另立中央”，那可就把弟弟林立果彻底坑害了（且不论同时给林彪带来的连带影响）。林立果毕竟是林立衡的亲弟弟，她怎么可能只为救父亲就毫无顾忌地置弟弟于死地呢？

所以，笔者分析认为：林立衡为了既救父亲，又不害弟弟，只好先向中央报告“林立果将要带走林彪”这样一个严重的后果，以引起中央的充分重视，努力达到截住父亲的目的。同时，又故意不报告产生这个严重后果的原因（即林立果曾经实施过杀毛行动），这样就能不泄漏弟弟所干的“弑君之罪”，等到事后别人追查林立衡当初检举的缘由时，就可以编造一些诸如“家庭内部纠纷”之类的说辞，把前一天检举的所谓“林立果将要带林彪逃走”一事给圆过去。

最后，也许正是由于林立衡的这种既想救父亲、又不想置弟弟于死地的两全其美的考虑，造成周恩来始终不能完全相信她的报告，以至周恩来采取的措施不坚决、不果断。最终，林立衡把父亲和弟弟都失去了。

◇ 毛周故意逼林出走不合情理

从情理上讲，毛、周故意逼迫林彪出走也是不合情理的。因为，这样做的代价太高昂，得不偿失。

逼迫林彪出走的方向无非是两个：出走广州（香港）或者出走苏联。如果林彪逃到广州，就有可能分裂中央，即使逃到香港也会造成轰动世界的恶劣影响。难道毛泽东、周恩来愿意看到这种结果吗？如果林彪跑到苏联，很可能会公开发表抨击毛泽东的言论。难道毛泽东、周恩来愿意看到这种结果吗？

我们来看看党史专家于南对林彪事件后果的评价吧：“写到党章上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怎么会一夜之间成了谋杀毛泽东的凶手？但这毕竟是事实。人们在震惊之余，开始了冷静的思考，许多人开始从个人迷信状态下清醒过来，怀疑，抵制文化大革命的人日渐增多。林彪事件确实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这当然还不是后果的全部，林彪事件的这种严酷结局极大地颠覆了人民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信念系统。人们几乎第一次开始怀疑，原来毛泽东也有错误，他选错人了，共产党也不全是对的。人们从此开始普遍性地怀疑文革，怀疑毛泽东，也同时怀疑共产党本身。

很显然，想用“逼迫林彪出走”这样愚蠢的方法打倒林彪，同时也将危及共产党、毛泽东本身，这实在是两败俱伤的傻事。

毛泽东当然不可能不预见到这些很明显的后果，他当然也不可能做代价这么高昂的蠢事（我们从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的身体迅速垮掉这个现象，就可以看出毛泽东本人是根本不愿意看到现在这种结局的）。对于周恩来方面来说，不论他是否考虑过从打倒林彪方面渔利的问题（笔者认为周恩来也还不是这种小人），周恩来自己显然也是热爱他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共产党的，他个人的利益从根本上说也是和共产党的命运紧密联系的，所以，周恩来也不可能干这种严重伤害共产党根本利益的事。

其实，想打倒林彪实在不是一件难事！根本用不着使用“逼迫林彪出走广州、国外”这种愚蠢的方式。以毛泽东当时的地位和威望（毛的一句话可以否定掉整个政治局的意见），随便找个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林彪身体不好）都可以将林彪赶下台，然后让他去养老，或者将他幽禁（如果还想置林彪于死地的话，则可以在幽禁的过程中，像常见的政治谋杀那样，使用给林彪服用慢性毒药之类的方法，置他于死地）。这样一来，既能达到改换接班人的目的，又能不造成社会动荡和人民整个信仰体系的崩溃。

总之，笔者对“毛泽东、周恩来在‘9 1 3’事件中是否故意逼迫林彪出走”的问题的评价是：1971年9月12日晚到9月13日凌晨，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没有故意逼迫林彪一行出逃。周恩来作为全权处理事件的负责人（毛泽东在256飞机起飞之前还不知情），在已经接到检举报告的情况下，是完全有条件、有可能成功阻止林彪出走的。但是周没能完成好自己的职责，这毫无疑问是一次失败的指挥，周恩来本人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另一方面，考虑到当时情况的复杂性和检举报告真伪的不确定性，以及周恩来个人的性格特点、为人处世风格，的确在当时情况下定下正确的决心有很大的难度，考虑了这些因素，所以也不便过多地指责周恩来。当然，失败就是失败，如果像不少站在当局立场的论者那样，还在歌颂周恩来处理此事件时的所谓“机智、果敢”，那就只能让人愕然了。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